

中国邮政开办 120 周年(下)

◆ 李崇寒

为进一步商谈国共通邮并寻求帮助,林卓午于 1941 年年底乘邮车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林卓午并顺利拟出通邮协定。不久后,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名义公布了《第十八集团军关于邮务问题的通令》,通令重申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邮政的政策,指出,“邮务系有关抗日战争,并带有国际性质之国家企业。各地军政当局,应尊重邮政章程及其行政与工作系统,并给以充分之业务便利与妥善之保护”。

林卓午返重庆途中,在成都对中华邮政高级职员们发表了如下讲话,“国共地区长期不通邮,根本不是共产党方面的刁难。这次亲自去与中共领导人接触提出了一系列开局、辟路、班期、经费、邮票、人事、交接手续等问题,无不一一同意照办,其顺利完全出乎预料”。

不过,国共通邮功臣林卓午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先是有特务对其在西安的住宅进行搜查,后又以“糊涂昏聩”为名对其撤职查办,经人担保后,林卓午才得保全,后来被贬到安徽省霍山邮局,直至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后,1946 至 1949 年,国共双方举行过两次通邮谈判,第一次直接导致国民党政府于 1947 年 1 月下令对解放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8 月,中华邮政总局下令停止国共双方交换邮件。尽管内战中,中共依旧奉行保护中华邮政的一贯政策,但国民政府屡屡翻脸,不仅禁止通邮,还强令中华邮政员工撤退。

1948 年 11 月,一位署名方胜仁的给中华邮政局公众服务课写信,

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收寄往沦陷区洛阳的家信还说得过去,为什么“现在都是中国人,却不收洛阳(已经被解放)的信,难道共区比日本人还厉害吗?”2 个月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批准试办国共两区通邮。

1949 年 4 月,华北邮政总局代表与中华邮政总局代表在北平就全面通邮开始正式谈判,达成协议。就在双方决议签订通邮协定当天,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做出“对中共通邮、电、汇兑一律停止”的决议,南北通邮回到隔绝状态。此时,离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顺利打通南北路剩没有几天,年底,中华邮政 2600 多个局所将面临被各级人民政府接管的局面。而在 1949 年初还热议的“国共通邮”将彻底成为历史词汇。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下设邮电部,11 月 1 日,邮电部成立,朱学范部长,王诤副部长就职,中国邮政重获新生。

邮电部成立时,人民邮政发展了 20 余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速度极为缓慢,通信设施也十分简陋落后。1949 年仅有 4207 个自办邮政局所分布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平均每个县只有两个。内地城镇的邮政设施也好不到哪里去。从 1950 年起,邮电部注意逐年增设邮政局所,调整和发展代办机构,大力发展邮政业务,恢复邮政通信,改善城乡投递,发展农村和边远地区的邮政通信。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罗淑珍,到“深山信使”王顺友、“溜索



■ 1963 年,周恩来(左四)邓颖超(左二)视察中南海邮电局,看望职工

姑娘”尼玛拉木,再到“最美邮递员”群体,每一个都是“情系万家、信达天下”的最好诠释。直到今天,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邮递员仍是人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

1998 年邮电分营后,中国邮政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十二五”期间,为更好的服务“三农”,践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中国邮政加大设立网点力度,不仅没有裁减每年都会巨额亏损的偏远网点,反而增加了 8440 个。2014 年底,中国邮政 5.2 万个支局所中,3/4 的网点、2/3 的邮路都在农村。每天,18 万名邮递员将 7800 多万件邮件和报刊等传递到城市乡村、千家万户。在世界各国邮政中,中国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的业务种类是最多的,服务范围是最广的。

信函、报刊、包裹、邮储、汇兑、贷款、保险、农资配送、农村电商等各类服务,都由中国邮政来提供。2012 年以来,全国邮政为农民配送化肥、农药等各类农资超 500 万吨。只要农户出现融资问题,小微企业资金出现短缺,邮储银行首先来解决。为更好地推进“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中国邮政依托邮乐网电子商务平台和 10 万多个村邮站,大力发展电商,光 2015 年 1-11 月交易额就已超过 102.2 亿元。

在海南安定县的中国邮政村邮站,村民们不仅可以缴电费、充话费、订报、转账、买机票,而且可以享受代收寄信件、助农取款、邮乐代购等服务,甚至还可以办理残疾人优待证、二孩准生证等证件。村邮站转型成为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不得不归功于中国邮政在便民服务方面的大力投入。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虽然导致邮政传统业务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但中国邮政紧紧抓住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机遇,探索对速递物流等竞争

性业务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采取“仓储配送供应链金融”模式,带动包裹寄递快速增长、做大做强。一方面,加强与阿里巴巴等电商企业及民营快递公司合作;另一方面,推行“走出去”,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海外仓,促进跨境电商发展。

诚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国华所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998 年邮电分营时,中国邮政总收入 287 亿元,亏损 179 亿元;到 2014 年,中国邮政总收入跃升至 4047.7 亿元,年均增长 18%,利润总额 356.5 亿元。十几年的时间,中国邮政进行多层次的改革,完成了大步跨越式发展,成为经营传统邮政业务、金融、包裹快递、电子商务的现代企业集团。

此外,中国邮政充分利用邮票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为社会提供兼具艺术性知识性的高雅集邮藏品。从 2013 年的《美丽中国》邮票,到 2015 年《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特种邮票,再到 2016 年即将发行的《海上丝绸之路》邮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巧妙浓缩于方寸世界间。

120 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展望未来,中国邮政将以建成世界一流邮政企业为战略目标,加快改革创新,推进转型升级,切实履行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义务。在“十三五”时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将成为以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为基础,以金融翼和寄递翼为重点,以中邮保险业务、包裹快递业务和农村电子商务为新的增长极的现代服务业集团。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 年 3 月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23.担任《书法》杂志篆刻编辑

1978 年,高式熊 58 岁,就在这“过两年就是退休年龄”的当口,版画家陈柯田推荐他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书法》杂志篆刻编辑,协助方去疾掌管篆刻方面的稿子。

衡山路 237 号是一幢上世纪 50 年代建造的四层水泥建筑,兼作“朵云轩”的工房和编辑部。编辑部在二楼的两间,编辑部主任余白墅管木版水印兼书法绘画书籍的出版,周志高是书法编辑,方去疾是篆刻编辑。

据《书法》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赵坚回忆:周志高拿了一本已出版的《书法》试刊给他看,说两个封面是郭沫若题写的,“我不由心起敬意。可是翻翻内容,尽是随着政治风波而起的作品,因是‘四人帮’垮台前出的,也难怪!”不久新闻出版局来通知,这本刊物停止外售、查封。据余白墅回忆:当时的社长吉少甫与郭沫若有亲,故郭老来上海,他被叫去奉陪,有机会请郭沫若题写刊名。

刊物被查封后,赵坚认为,虽然试刊内容有误,但刊物还是可以办的。他与周志高商量重新起草报告,得到社长周蔚云的支持。经新闻出版局批准,十六开本的双月刊《书法》杂志出版,由赵坚任主编,周志高任责任编辑。又陆续续调进黄简、王宇仁、吴崇文、高式熊、潘德熙、方传鑫、吴建贤、刘小晴等,一时间人才济济。还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同仁叫陆心龙,现在已很少有人记得了。在外人看起来,高式熊在书法篆刻上名气不小了,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总说不过去;进入《书法》编辑部,算是归队了,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

高式熊起初也对新工作满怀憧憬,上岗后才发现自己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通过来,要求刊登稿子。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件稿子,有缺点就指出来,希望作者修改;可是,作者懒得改,有的对他说:“依帮忙改改好拉倒!”还有人让他推荐稿子刊登,他认为不够格,非常反感……

“就这样,每天看完所有的来稿,混混日



脚,混了两年就退休了!”

比较前后两种工作环境,他还是喜欢工厂,“工人做事认真,讲话直爽,讲实话;社会上讲虚话,无聊的吹捧,争名夺利……”他出出版社视作“社会上”。在“社会上”,有人讽刺他顽固不化、守旧,只会捧老古董,没出息;同样也有人夸他路子正、功底扎实,所以越做越好。

不过,现在回想书画社那两年,也不是没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情节。1979 年,《书法》杂志举办群众性书法比赛,应征稿件雪片一样飞入编辑部,落款“苏局仙”的稿子——临《兰亭序》令编辑高式熊眼睛一亮,“这是件特别的东西!”待谢稚柳等全国评委聚在一起看,也纷纷叫好,就给评了个一等奖。苏局仙还是“末代秀才”呢,一辈子默默无闻,直到 98 岁上得此大奖,一时间门庭若市,周浦牛桥通往苏家的路也被修好了,书协会员、文史馆馆员的头衔都给了他,正在拍摄纪录片《话说长江》的日本摄影团队也闻讯赶去拍了三天。近百岁的新晋名人吃不消了,需要有关方面帮忙控制登门拜访的人数……人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沙里淘金的编辑,与苏局仙素不相识的高式熊却说:“做事不好为个人的,我是凭作品,发现人才就要公之于大众。”

进书画社没多久,高式熊就由周志高带去见了宋日昌。从上海市副市长任上退下来没多久的宋日昌,当时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业余爱好写写字,所以拜他为师。从此,他就经常被接去指导这位老来学吹打的学生,“给我的字提提意见吧!”这是学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时候,一大早就是一通兴奋的电话,“我照你讲的用笔,试过了,写得汗都出来了!”后来,请宋日昌写字的人多了,他早上写,高式熊就在边上看着,及时给予指点。“你讲得有道理啊,我用上去了,的确好的确好!”老师分享着学生的喜悦,师生俩交往了三四年,直到宋日昌去世。

王讯漠,现在是空军某部副司令员、少将,中国书协会员。当年,他想学篆书,书法家刘小晴给他指路:“学篆书嘛,问高式熊好了!”高式熊看他喜欢写,就手把手地教。他要临老师的篆书,老师摆摆手,“我的篆书太推板,依要去读《说文解字》,临汉碑。”

18.给国史馆总裁上书

在《戒诗五章》的第二首,先生写道:“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此泪何所从? 万一诗祟焉。今暂空尔心,心灭泪亦灭。有未灭者存,何用更留迹?”

先生在夜深人静时,百感交集而泪湿满襟。其中,有些原因是自己诗心未灭。但是,他想进入万念俱寂的无我之境,能做得得到吗? 中国伟大的传统士人感时伤世的情怀,在先生的心中是难以消释的。这里不简单是写诗和戒诗的问题纠结,而是一种融化在血液中的人格元素在继续发酵、奔突、沸腾。

在这一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驾崩。其次子旻宁继承皇位,颁诏第二年(1821)为道光元年。这艘锈迹斑斑、到处布满罅隙的巨轮,虽然继续航行在大海上,但前方波浪汹涌、暗礁密布,正面临触礁、沉没的噩运。但是船长和他的船员们意识到了吗?

龚自珍于道光元年(1821)春,到任内阁中书,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统志》,任校对官。以龚自珍的才学而只能屈居一个小小的校对官,只能让人人为之扼腕。以龚自珍的个性,他也不会默默沉寂地甘于当一个文字校对。于是,紧接着就有了有点不合官场潜规则的上书举动,给国史馆总裁上书一封《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如果在这封书中,只是指出《清一统志》中的差错也就罢了。而仅仅是指出差错,显然也不需要特意长篇大论地写一封信给“总裁”,在书上做上记号,交上去即可。但先生的信有五千多字,除了指出《清一统志》中的十八处疏漏和错误,同时在信中“论西北塞外源流,世系风俗、山川形势”,结果“总裁”将他的信札删掉了两千字,其理由是“头衔不称”。其潜台词无非是,你一个小小的校对官,干好字词差错校对就可以了,用得着纵论西北大势吗? 是向我“总裁”显摆你的学识吗? 这是典型的“位卑而言高”啊! 这位上司显然不是什么胸怀大度识才之人,此事引起上司心中的不快是必然的。而龚自珍对如此森严的等级观念也感到很不适应,他在后来的《己亥杂

诗》中曾就此事而感慨:“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腴尾但书臣向校,头衔不称霸其词。”

龚自珍上书的举动不仅于此,还在这年春,上书了觉罗宝兴。这封上书的内容同样涉及了西北的问题。这封信是写给觉罗宝兴的,觉罗宝兴正是龚自珍第一次参加乡试中副榜时的房考官。在龚自珍到任前获知觉罗宝兴出任新疆吐鲁番领队大臣。按照官场不成文的规则,觉罗宝兴担任过龚自珍房考,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师生关系,因此,龚自珍觉得以师生之谊给他写信不算唐突,言辞十分谦恭。

先生的信名为《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信中着重提出如何对待回部的有关政策问题。信的篇幅长达数千字,对如何安抚、治理边塞提出了许多建议,其核心理念是对少数民族要以诚相待,“不以驼羊视回勇,不以禽雀待回女”,信尾有一段结语说“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爱惜翎顶,爱惜衣食,嗟诵经典。耕者毋出屯上,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虐上,防戍于极微,积福于无形……”龚自珍在这里,不仅仅是提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问题,同时从根本上谈到了安抚人心的关键,是建立一种价值观念认同基础上的伦理道德秩序。这样才能使边塞真正做到安定祥和。龚自珍在呈送此信时,还附上经过反复修改的论文《西域置行省议》。

这封信呈上后有什么回音? 也不清楚。未见龚自珍后来的文字中有对此上书后续反馈的任何记录。觉罗宝兴是三品大员,对一个七品小校对官的来函不予回复,也并不令人奇怪。也许,龚自珍与他关系的密切程度远不及与林则徐,可以推心置腹。让龚自珍感到特别失望的是,他的重要论著《西域置行省议》中,有诸多如何加强西部管辖、安抚边民的建议,如主张西域置行省,由内地移民至边疆,发展耕牧,并健全军事组织,防止外来入侵者。可惜这些建议都未能得到重视和采纳。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歆耕

